

普洱—大理—丽江—迪庆—昌都—拉萨，一条隐伏在崇山峻岭之间的苍茫古道。历史上它曾经是各民族之间物资交流的重要经济纽带，伴随着至今回响着的清脆悠扬的马铃声，它同时也成为一条精神的河流。

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文·图/ 熊 燕



茶马互市正式兴起于唐、繁荣于宋，元朝以后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流通道。而唐时藏族先民建立的吐蕃政权、宋时白族先民建立的大理政权、明时纳西族木氏土司，又使这三个民族在政治需求的推动下在滇西北茶马古道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宗教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其脉络更显清晰。

唐朝——吐蕃政权
——藏族主导时期

唐朝是吐蕃王朝的全盛时期，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以后，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他的势力向西南发展，对滇川藏交界地区，特别是滇西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永隆二年（公元6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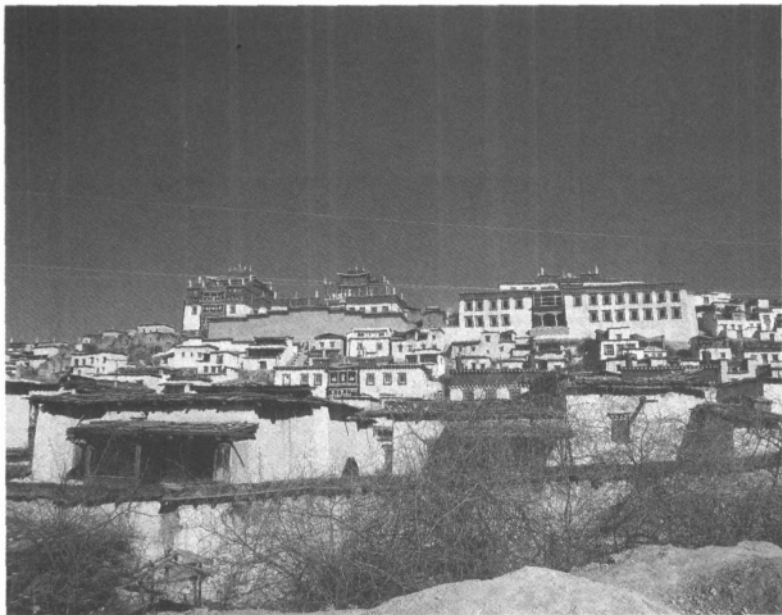
吐蕃王朝在今天的丽江塔城境内设立了神川都督府和“铁桥节度”，很多纳西族先民（当时称为“麽些”）聚居地都被纳入这一范围内。

在佛教传入吐蕃以前，藏族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苯教。吐蕃王朝建立之初，苯教在吐蕃王朝中有相当于国教的地位，百姓也笃信苯教。随着吐蕃势力进入滇西北，苯教也扩散开来。

苯教在滇西北的传播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吐蕃不断对外用兵时期。在战争过程中，军中的巫师和信仰苯教的藏兵就已经把苯教带到了纳西族地区；另一个是吐蕃“兴佛抑苯”时期。吐蕃王朝建立以后，苯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青

睐，佛、苯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斗争。“兴佛抑苯”在赞普柳松德赞时期被推到了极致，在一场佛、苯辩论之中，苯教徒失败，赞普给了他们三个选择：一是改宗佛教、一是放弃苯教信仰、一是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有的苯教徒放弃了信仰，或者改宗佛教，但还有一些来到了吐蕃势力控制比较弱的滇川藏交界处，使得苯教在纳西族先民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苯教和东巴教都是多神崇拜，有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相结合的特点。今天，在东巴教中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苯教的影子。如：东巴教的教祖称为“丁巴什罗”，应该是苯教祖师“丹巴喜绕”的音译转读；东巴经中有很多用藏语读的经书，也有用藏语诵的经；



两种宗教在祭祀上多有雷同，如祭天仪式、对火（锅庄）和木石崇拜等；东巴教中一些神灵名号和苯教相同；在纳西族的传说中还有很多关于丁巴什罗和丹巴喜饶斗法的故事。

当时在白族先民中产生很大影响的是西藏的“旧密法”，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以后南诏归附于吐蕃的四十二年间，西藏密教对南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旧密法”是藏传佛教前宏期由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带来的教法，大理国时期的著名宫廷画师张胜温的画卷中，就绘有西藏密宗中的神祇。

宋朝——大理政权 ——白族主导时期

与唐朝的连年战事以及社会的内部矛盾，最终使吐蕃王朝四分五裂。经过唐与南诏联手的“铁桥之役”以后，吐蕃对滇西北的影响几乎丧失殆尽。在白族地区几经王朝更替，段思平建立的

大理政权将白族带入了全盛时期，白族成为滇西最有影响力的民族。

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在北方来自金国的威胁使宋对南方的稳定更加重视，大理政权在其中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宋廷内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偏见，即把大理看作是唐时的南诏，认为唐朝的灭亡是南诏导致的，所以不愿与大理有太多的政治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仅限于频繁的经济贸易联系，“茶马互市”在这一时期十分繁荣。

大理建国以后，段思平把佛教定为国教，采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策略，全民信教，被称为“妙香佛国”。据史书记载，大理国王位的22传中，有八位王辟位为僧。大理政权灭亡以后，佛教在大理的发展中进一步世俗化，被视为“土教”。

白族还有自己的本主信仰，“本主”的意思是“本境之王”，是一种地缘性的信仰。关于本主

信仰缘起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在南诏时期它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本主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六类：自然本主：动植物；

英雄本主：大多是本民族的英雄；大理地区历史上的诏主、国王和文臣武将；与白族有关的历代封建王朝将领；平民本主，多为孝子、节妇和工匠；佛道教的神祇，如大黑天神、文昌、李靖等等。

从本主的来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白族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首先，本主中的平民本主大多是在汉文化中被推崇的孝子、节妇，这反映出了儒家文化对白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次，在本主中有不少来自佛道教的神祇，体现了白族信仰上的延续性；第三，历代王朝与白族发生过战争的一些将领也被奉为本主，这也反映出白族文化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所具有的包容性，与白族有更多与外界文化互动的机会不无关系。

白族地处交通要道，接触汉文化较早，受汉文化的影响更大。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其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更具独立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与外界交流越频繁的文化，其自身对外文化的吸纳能力就越高，就越容易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文化，其文化就更具活力，这也使得白族成为发展得相对比较快的民族。

明朝——木氏土司

——纳西族主导时期

明朝是纳西族历史上的鼎盛

时期。纳西族聚居于滇川藏三省交汇处的边缘地带，唐初，吐蕃曾一度南下到洱海地区，但始终未能站稳脚跟，又回到了金沙江以北；南诏也曾试图在中唐时期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到滇西北，但也未能如意。吐蕃与南诏对于边缘地区的控制都显得力不从心，这正好给处于藏族和白族中间的纳西族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

明朝继承了元朝对藏区的管理，但朝廷非常担心退居北方的蒙古势力南下与藏族联手，所以在北方驻屯了大量军队，从而造成南方兵力的不足，于是效仿前朝“以夷制夷”的政策，积极在滇川藏交界地扶植地方依靠力量。明军攻克大理以后，当时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德率众主动归附明军，从此被不断封官赏赐，明朝皇帝还赐姓“木”，并以“世袭土知府”的身份统治丽江。在明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的统治范围达到了今天的迪庆、怒江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地区。

木氏土司在文化上持兼收并蓄的态度，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在宗教上也采取多教并存、共同发展的态度，其中就包括了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支持。

明时噶玛噶举派在康区颇具影响力，而中央王朝对该派也多有偏爱。木氏土司深知藏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点，因此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自然也超过了其它教派，他们之间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借着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木氏土司巩固

了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同时，噶玛噶举派也从木氏土司处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支持，不但兴建了很多寺庙，还在土司的主持下刻印了康区的第一部藏文雕版《大藏经·甘珠尔》。

由于木氏土司的推动，自明代起藏传佛教在纳西族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有很多人出家为僧，纳西族中出现过许多的高僧和居士，还出现了藏传佛教的活佛在藏纳之间交替转世的现象，如噶玛噶举派的仲巴活佛。12世纪中叶，噶玛噶举派祖师噶玛拔希在康区弘法的时候，今甘孜白玉县噶妥寺活佛南卡森格一直追随噶玛拔希，人称“仲巴”，意为“亲近者”，从此他的历代法号前面都冠以“仲巴”二字。第一到十四世仲巴活佛都是藏

族，十五世仲巴活佛转世于丽江木氏土司家，他精通汉藏两种文字，在滇川藏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十五世仲巴活佛圆寂后，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指示说：灵童“生于三賧王（木氏土司）府宫南面，家有三房一照壁，壁外有长流水，壁内有棵白花树”。教徒们按法王的指示去寻访，果然在大研镇石牌坊南的望族“张大老爷家”寻访到了转世灵童。

此时，藏传佛教在滇西北藏民中的影响仍是主导性的，苯教的势力进一步衰微，很多只以民

间宗教的形式存在。由于清初的“改土归流”和汉文化在丽江的传播，东巴教和藏传佛教在纳西人中有逐渐衰落的趋势，喇嘛在纳西族中的社会地位不是很高，一般人非不得已不会情愿当喇嘛，但宗教对民族观念的深刻影响仍然存在。白族的本主信仰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其一贯的独立性，它



已经获得扎实的群众基础，成为云南宗教中的一支独立发展体系。

茶马古道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极大地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如今，清脆悠扬的马铃声已离我们远去，茶草流香也渐渐散尽，但那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上绘制、雕刻的佛陀、菩萨、海螺等形象却留了下来，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增添了层层叠叠的历史厚重感，它们在无言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条古道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沧桑。今